

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制度红利与经济转型：印度的经验、教训与启示（12BJL052）”

制度红利与经济转型： 印度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ZHIDU HONGLI YU JINGJI ZHUANXING
YINDU DE JINGYAN JIAOXUN YU QISHI

邓常春 邓莹 任卫峰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玮
责任校对:敬铃凌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红利与经济转型:印度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
邓常春, 邓莹, 任卫峰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614-8645-0

I. ①制… II. ①邓… ②邓… ③任… III. ①转型经
济—研究—印度②经济增长—研究—印度 IV. ①F13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6482 号

书名 制度红利与经济转型:印度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著 者	邓常春 邓 莹 任卫峰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8645-0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9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二章 印度的千年兴衰	(13)
第一节 从前现代社会到 1980 年	(13)
第二节 经济改革时期 (1980 年迄今)	(28)
第三节 服务业的增长：印度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生动注脚	(42)
第三章 经济增长的来源：要素投入与生产率提高	(70)
第一节 印度经济增长中的要素投入与生产率提高	(70)
第二节 经济增长的来源：中国与印度的比较 (1978—2004)	(92)
第三节 生产率的提高：中国内地和印度与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比较 (1970—2011)	(101)
第四章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132)
第一节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132)
第二节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现状与趋势	(135)
第三节 印度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兼与中国比较	(149)
第五章 民主体制的经济绩效与社会影响	(161)
第一节 印度民主体制的建立及其特点	(161)

制度红利与经济转型：印度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第二节 印度民主体制的经济绩效与社会影响·····	(166)
第六章 公共治理、法治与腐败·····	(178)
第一节 治理：含义及其评估·····	(178)
第二节 印度的公共治理·····	(184)
第三节 印度的法治及其经济影响·····	(199)
第四节 印度的腐败及其治理·····	(218)
第七章 “保留政策”与社会碎片化·····	(232)
第一节 从地理名词到民族国家·····	(232)
第二节 种姓制度、“保留政策”与社会碎片化·····	(237)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	(255)
参考文献·····	(263)
致 谢·····	(276)

第一章 导 论

一、经济增长的现实语境：资源环境危机与气候变化风险

近代以来，伴随“科学万能”的思想和“人定胜天”的激情，无节制耗费自然资源并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经济增长模式，源自西方，逐渐风行全球。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源消耗和需求拉动为支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带来严重的环境后果。世界自然基金会在 2012 年的《地球生命力报告》中指出，自 1966 年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翻了一番，人类正在使用相当于 1.5 个地球的资源来维持生活。照此下去，到 2030 年和 2050 年，人类将分别需要 2 个和 2.9 个地球的资源，才能满足生存需求。

在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让不计其数的人摆脱了贫困，同时也增加了对国内外自然资源的需求。中国消耗的矿物、化石燃料和其他原材料，从 1970 年的 17 亿吨增加到 2008 年的 226 亿吨，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资源消耗国，是全球第二大资源消耗国美国的 4 倍。同时，中国人均物质消费量也从 1970 年全球平均消耗量的约三成增加到 2008 年全球平均消耗量的约 1.5 倍。

上个 10 年里，中国的石油消耗量几乎翻了一番，天然气消

制度红利与经济转型：印度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耗量增长了 5 倍，发电量则增长了 9 倍。在 10 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能源总需求增长了 60%。如果从 1990 年算起，总需求则增长了 3 倍。目前中国的能源日消耗量占全球的 22%，而这还只是开始。在今后 20 年，预计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将再次翻番，天然气消耗量将增加不止一倍。能源消耗总量也将增长 70%。

虽然中国一直在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但并不足以弥补开采、加工和消耗自然资源带来的环境破坏。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3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到 2012 年年底，中国约六成的地下水和三成的主要河流遭到污染，大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不足 1/4。

在资源和环境危机之外，还面临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风险。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使用，增加了大气里温室气体的浓度，导致了日益紧迫的气候变化风险。各国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普遍认同一点：全球气温上升，应以高出前工业时代的气温 2 摄氏度为限，而要将气温保持在这一限度内，就必须大幅度降低全球碳排放量。

中国只占全球历史总排放量的 11%，而印度的这一比例则更低。但是，考虑到中国和印度庞大的人口，以及正在推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这两个国家将成为未来全球气温和气候的主要决定因素。实际上，若不以内生产总值（GDP）而以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衡量，中国已是全球主要的工业国家之一，而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2006 年超过美国，自那时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2013 年，中国向大气中排放了 100 亿吨二氧化碳，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28%，超过美国（14%）和欧盟（10%）的总和。按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到 2019 年，中国的碳排放量将超过美国、欧洲和印度的总和。而印度的碳排放总量将在 4 年后超过欧盟。如今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45 倍，已超过欧洲。

总之，气候变化风险与资源环境危机相叠加，这是中国和印

度这样的人口大国面临的现实语境，这决定了它们的经济增长及工业化和城镇化历程，不可能沿袭欧美国家的老路，而必须探索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新路。这就需要实现经济转型，经济增长从倚重增加要素投入转向倚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经济转型：从增加要素投入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增长会计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从供给层面可以解构为三个部分：劳动力的增加、资本的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较这三个部分的贡献可以了解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除了要素积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自1979年经济起飞以来，无论是同时期，还是经济增长的类似阶段，中国的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显著高于其他亚洲先进经济体^①。樊纲指出，1987年至2005年，在中国经济年均9.5%的增长中，5%~5.5%来自资本和劳动力投入，3.8%~4.2%的增长来自全要素生产率。中金公司在帕克（Park）的研究结果基础上，分析了世界各国从1992年到2007年的增长。其研究表明，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到50%左右（劳动力贡献了6%，资本贡献了43%），其占比明显超过同时期的发达经济体和亚洲新兴经济体^②。

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受益于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中金公司利用“HP”滤波测算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

① IMF, 2006. Asia Rising: Patter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② 中金公司，《2011：宏观经济研究报告》，2011-11-15；Park, Donghyun and Jungsoo Park, 2010. Drivers of Developing Asia's Growth: Past and Future.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35,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制度红利与经济转型：印度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增长的潜在增长率。结果显示，潜在增长率有三个快速增长期（分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农村改革，90 年代初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与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和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在时间段上都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相一致，体现了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而三个快速增长期后，随着红利释放完毕，潜在增长率也随之下降^①。

当前，伴随前几轮改革带来的红利逐渐释放殆尽，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呈下降趋势。经济合作可发展组织（OECD）估计，1978 年至 2003 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度增长率为 3.7%，2003 年以后下降为 2.8%。纳兹鲁·伊斯拉姆（Nazrul Islam）和尔比奥·代（Erbiao Dai）的研究也显示，改革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但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减缓。亚洲生产率组织（APO）有类似的研究结论，其 2010 报告指出，1970 年至 2007 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 2.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 43.3%。其中 1985 年至 1995 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 4.1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 53.7%，而最近 10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到 2.96% 和 33.8%^②。

与此相应的是，2008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明显放缓，由“十一五”期间的超过 10% 下降到目前的 7% 左右。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既有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有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后追赶效应的递减。当前，要避免经济增长率的大幅下滑，必须深化改革，提高效率。但是，如何进一步改革与调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妨将眼光投向印度，以之为借鉴。

① 中金公司，《2011：宏观经济研究报告》，2011-11-15。

②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2010. APO Productivity Databook 2010.

从经济增长与转型的角度看，印度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一，在前现代社会的 1000 多年里，印度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和最强盛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 1500 年之前曾一度分别高达 33% 和 27%，1500 年前后均为 25% 左右，到 1820 年，分别为 33% 和 16%。其后迅速下降，1870 年分别为 24% 和 12%，1913 年为 9% 和 8%，到 1950 年年均仅为 4%。第二，20 世纪 50 年代起，印度和中国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缺乏活力，增长缓慢。第三，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印度和中国都开始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增加市场力量，经济增长大为加快，成为新兴市场国家中的明星。第四，从国际视野看，在全球资源、能源和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面临严重的资源环境和碳约束，都需要探索不同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增长之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更多地倚重提高要素生产率而不是增加要素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第五，当前，印度和中国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经济转型，从增加要素投入转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印度的公共治理与社会结构显然不同于中国，其经济增长业绩也不如中国，但多数研究表明，印度近年来的市场化改革显著释放了制度红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明显提高，显示出较好的增长潜力。斯瓦萨伯拉蒙尼亚（Sivasubramonian）、多拉克亚（Dholakia）、古哈和巴里（Guha and Bari）、维尔马尼（Virmani）、博斯沃斯·柯林斯和维曼尼（Bosworth Collins and Virmani）的研究均显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印

制度红利与经济转型：印度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度经济增长^①。阿布哈·古普塔 (Abhay Gupta) 估算出 1960 年至 2004 年, 全要素生产率对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在 35%~70% 之间 (具体数值取决于人力资本的估算)。印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是中等, 70 年代是负数, 而 80 年代之后加速, 2000 年以来达到 3%~4.5%, 这表明, 印度最近 30 多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增长^②。这与斯瑞尼瓦萨和腾达卡尔 (Srinivasan and Tendulkar)、罗德瑞克和萨伯拉曼尼姆 (Rodrik and Subramaniam)、科里 (Kohli)、帕纳格瑞亚 (Panagariya) 的研究结果一致^③。高盛 (Goldman Sachs) 的研究显示, 1960 年至 1980 年, 印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0.25%, 80 年代实施经济改革以来, 这一数字增加到 1.6%^④。

① Sivasubramonian, Siva, 2004.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 1950-51 to 1999-2000*, OUP, New Delhi; Dholakia, B, 2002. "Sources of India's Accelerated Growth and the Vision of the Indian Economy in 2020", *Indian Economic Journal*, Vol. 49, No. 4; Guha - Khasnobis, Basudeb and Bari, Faisal, 2003. "Sources of Growth in South Asian Countries", in Isher Judge, Ahluwalia and John Williamson (eds), *The South Asian Experience with Grow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Virmani A, 2004. *Sources of India's Economic Growth*, ICRIER Working Paper No. 131. Barry Bosworth and Susan M. Collins, 2007. Accounting for Growth: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2943.

② Abhay Gupta, 2008. *Indian economy-TFP or factor accumulation: a comprehensive growth accounting Exercise*, paper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consideration to journals, from author's research homepage.

③ Srinivasan, T. N., and Suresh D. Tendulkar, 2003. *Reintegrating India with the World Econom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drik, Dani, and Arvind Subramanian, 2005. "From 'Hindu Growth' to Productivity Surge: The Mystery of the Indian Growth Transition," *IMF Staff Papers*, vol. 52, No. 2; Kohli, Atul, 2006. "Politics of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 1980-2005 - Part I: the 1980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April 1: 1251-1259; Panagariya, Arvind, 2008. *India the Emerging Gia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④ Goldman Sachs, 2007. *India's Rising Growth Potential*, 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 152.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印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正在赶超中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在经济起飞后的三个十年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呈现出先升后降的态势，而印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前两个十年里只有中国的一半，但在第三个十年里突飞猛进，基本与中国持平^①。博斯沃思（Bosworth）和柯林斯（Collins）运用增长会计法，估算了 1978 年至 2004 年，资本、劳动力、教育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印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及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深化，而与东亚及中国相比，印度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显著^②。张勇等运用改进的新古典技术进步模型分析了储蓄、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劳动生产率等要素对中印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其结论是，自 1992 年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甚至出现连续数年的负增长。而自 1991 年以来，印度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稳步增长，其增长速度在 1995 年左右超过了中国^③。这与前述纳兹鲁·伊斯拉姆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结论一致。

博斯沃思、柯林斯和维尔马尼（Virmani）依据增长会计法，计算出 1960 年至 2004 年印度经济增长的来源^④。印证了广泛流传的观点，即 1980 年之后，印度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0 年以后，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明显加快，其年均增长率从 1960 年至 1980 年的 3.4% 增加到 1980 年至 2004 年的 5.8%。值得注意的是，在 1960 年至 1980 年期间，几乎全部的产出增长都

① IMF, 2006. *Asia Rising: Patter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② Barry Bosworth and Susan M. Collins, 2007. *Accounting for Growth: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2943.

③ 张勇等：《中印发展潜力的比较研究》，《经济研究》，2009 年，第 5 期。

④ Barry Bosworth and Susan M. Collins, 2007. *Accounting for Growth: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2943.

制度红利与经济转型：印度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 1980 年以后的增长，则更多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得益于 1980 年之后实施的经济改革与开放政策。1960 年至 1980 年，从总产出和单位产出来看，印度的增长不及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也不及中国。尽管印度单位资本增加的贡献可与拉丁美洲和非洲相比，但源自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却比较低。与此相对照的是，1980 年之后，印度的增长超过除东亚之外的地区，年均增长率比工业化国家高出 2%。当印度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加速提高时，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都陷入低迷。尽管印度资本积累的贡献比中国及东亚低很多，但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显著。

三、公共制度与经济转型

公共制度的质量是一国经济转型和长期增长的关键基础。印度的市场化改革是有限和渐进的，但成效却很显著。同期实施经济改革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其改革更为深入和广泛，但绩效却不如印度。从倚重增加要素投入到倚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印度的经济转型及长期增长与其公共制度密切相关。印度在独立之初构建的三项公共制度：即政治上的议会民主体制，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保留政策”（reservation），深刻地影响到印度的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指导，运用制度经济学和新比较经济学方法，围绕印度的公共制度与经济转型，系统深入地研究以下问题：印度的公共制度到底有些什么特点？公共制度对印度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有何影响？市场化改革及其他制度演进释放出怎样的制度红利？是什么促进了印度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制度缺陷对于印度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又构成什么样的挑战？印度的公共制度呈现出怎样的演变趋势？印度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和长期经济增长有何启示？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先简略勾勒印度千年以来的兴衰，凸显其经济改革以来的转型与快速增长，并特别分析了印度服务业的超常增长。接下来依次从要素投入与生产率的提高，人口红利等方面，详细分析印度经济的增长来源；然后从民主体制、法治、公共治理、“保留政策”与社会碎片化等方面，深入探寻印度的公共制度对其经济转型和长期增长的影响，最后是结论与启示。（见图 1-1）。

具体而言，本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是《导论》，阐述选题意义与研究目的，文献综述、基本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可能的贡献与不足。第二章是《印度的千年兴衰》，介绍印度自前现代时期到 21 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尤其是服务业的增长）。第三章是《经济增长的来源：要素投入与生产率提高》，分析要素投入与生产率提高对印度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对比了印度和中国及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情况。第四章是《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对比分析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的人口增长趋势，以及印度收获人口红利面临的制约。第五章是《民主体制的经济绩效与社会影响》，分析了印度民主体制的建立、演变、特点及对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的促进与阻碍。第六章是《公共治理、法治与腐败》，分析印度的公共治理、法治及其对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的影响，以及印度饱受诟病的腐败及其治理。第七章是《“保留政策”与社会碎片化》，分析了种姓制度在现代印度的延续、独立以来的“保留政策”、社会碎片化及其对公共治理的挑战。第八章是《结论与启示》。

制度红利与经济转型：印度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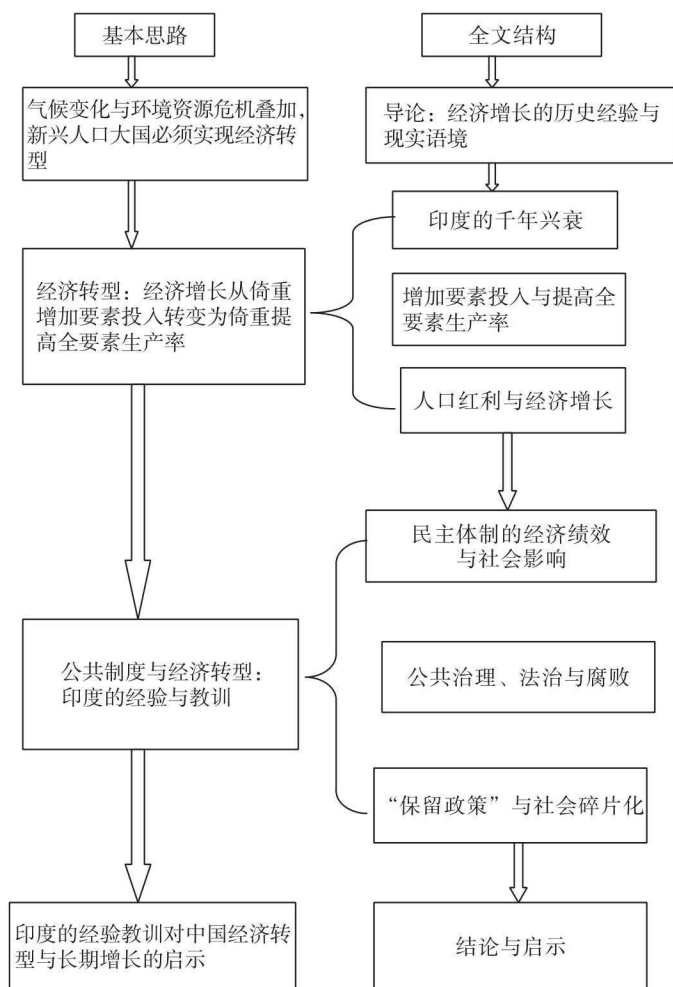


图 1-1 基本思路与结构

本书主要采取新比较经济学方法，对制度的演进、变化、多样性以及制度演变与经济转型及增长的互动，进行详细的描述与分析。

本书的基本观点：

面临日益严重的全球资源、能源和环境危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人口大国，必须实现经济转型，经济增长从倚重增加要素投入转为倚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这需要汲取制度红利。通过制度变革与创新，为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

印度在独立之初构建的三项公共制度，深刻地影响到其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民主体制及其框架下的法治，保证了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稳定，也保证了改革虽然渐进却不会倒退，为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心理预期和制度支持；市场化改革释放了巨大的制度红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转型及快速增长；而“保留政策”则加深了社会的碎片化，对公共治理和长期经济增长构成巨大的挑战。

中国社会的高度同质性、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高度认同感以及富有效率的政府，这是印度无法比拟的中国优势，如果能在此之上不断完善法治和公共治理，推进市场化改革、珍视和维系社会同质性与民族凝聚力，避免印度式的社会碎片化，则制度红利将更有力地支撑中国经济的转型与长期增长。

本书可能的贡献：

既有的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较多地关注印度经济增长中的要素积累，而对制度红利缺乏深入探讨。本书则详细研究印度在民主、法治、市场化改革和公共治理等方面的制度变迁，制度红利对经济转型和长期增长的贡献，以及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

既有的相关研究，对印度公共制度的缺陷关注不多，而本书深入研究印度公共制度的缺陷，其历史、文化和社会成因，其对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形成的挑战及未来的变革趋势。

既有研究对中国经济转型和长期增长中制度变革和制度红利的分析，较少以印度为参照系，而本书关注印度经验与教训对中

制度红利与经济转型：印度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国的启示。并指出，中国在社会同质性、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等方面拥有印度无法比拟的优势，只要善加珍视，则在制度红利对经济转型和长期增长的贡献这方面，中国或能超过印度。

本书的不足：

由于作者计量经济学功底不厚，水平有限，加上印度公共制度的复杂性，难以找到恰当的变量，定量分析公共制度对经济转型和长期增长的影响。所以，本书定性分析较多，而定量分析不足。期待以后有高明者，运用计量方法，对本书的结论进行验证。

本书各个章节既相对独立又密切相关，因此，少数议题如法治与服务业，“保留政策”、社会碎片化等，在不同的章节均有涉及。虽然各处侧重点不同，文字表述也尽量不同，但读来难免有少许重复之感。还请读者海涵。

第二章 印度的千年兴衰

第一节 从前现代社会到 1980 年

一、前现代社会繁荣的印度

在前现代社会的一千多年里，印度与中国一样，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和最强盛的国家。印度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 1500 年之前曾一度高达 33%，1500 年前后为 25%，即使到 1820 年，也还占 16%。其后迅速下降，1870 年为 12%，1913 年为 8%，到 1950 年仅为 4%（见图 2—1）。